

1977—1978 年



向水屋追懷

本文原刊《大公報·大公圖》，1977年10月29日。其後收入《向水屋筆語》。

我的住居並非向水。曾經是向過水的，那是許久以前的事。而且還向過一個頗長的期間。自從那時以後，換過不少住處，都是坐落在屋與屋之間。在這個狹小的都市裏，樓房愈建愈多，愈高也愈密，住在這裏面的人，連山也不容易看到，更不要說看到水了。¹

但是無論住在什麼地方，我的壁上都是掛著寫了「向水屋」三個大字的一張橫額。有些新朋友偶然到訪時看到了，往往笑說那三個字同我的住居環境不相符。可是我還是讓這橫額繼續掛下去。

這張橫額是徐悲鴻²先生題的。徐悲鴻是畫家，他的字跡卻不像他的畫那樣為人所習見（除了他自己的畫冊封面上的題字），我卻擁有他的墨寶，這對於我來說是十分珍貴的。

我同徐悲鴻原來並不相識，那張題字的來歷是很偶然的。那是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事。某一年的夏季，朋友畫家王少陵³應邀為中區思豪酒店⁴作一張以「孔雀開屏」為題的巨幅壁畫，酒店還為他在樓上開了個房間，供他憩息。這個期間，徐悲鴻恰巧來了香港，住進了思豪酒店。徐悲鴻在進出之間看到了王少陵那幅接近完成的壁畫，似乎頗為欣賞，於是兩人由相識而至於成為藝術上的朋友。由於大家都暫住在酒店同一層樓的房間，有機會時相過從。王少陵是為著能夠結交到這位藝術界前輩，能夠獲得他的教益深感榮幸的。從後來他常常接到徐悲鴻由異地寄給他、而他又公開讓我過目的那些信看來，我知道徐悲鴻是個謙虛而又富有熱情的藝術家。

就在那個期間，有一天王少陵到我的住處來。告訴我，他買了宣紙，請徐悲鴻給他寫了一個條幅，同時也請他給我的住居寫一張橫額。隨即把帶來了的一卷宣紙展開給我看，上面是三個筆畫剛勁而又帶有個人風格的字體：「向水屋」。還有上下題款。在署名下面，蓋上篆刻的「陽朔之民」四字的硃紅印章。

從此，我住居的壁上，便有了一幅名符其實的珍貴的題名。

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軍攻陷香港，許多不方便保存的東西都忍痛毀去了，這張徐悲鴻題字摺疊起來，體積不大，我把它夾進一本書裏面，塞進一隻滿載舊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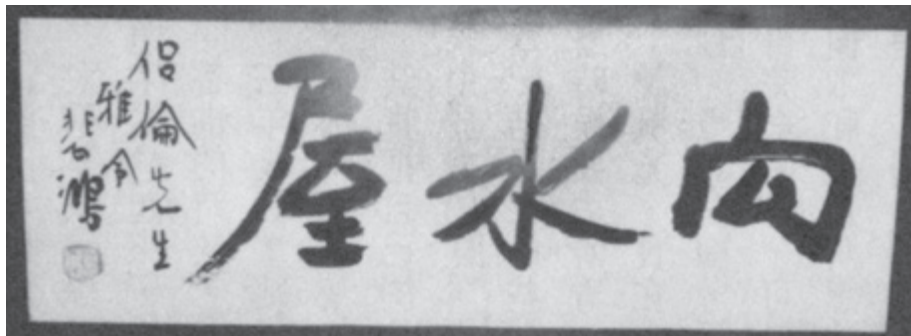


抗日戰爭爆發的一年，漫畫家廖冰兄⁶準備回內地去參加抗戰工作，在我的紀念冊裏寫了這樣的題句：

……打算訪問向水屋的丰采，怕他年我歸來，炮灰填滿了海，無水可向了。深願你屋前的水族，有一天會成為能了解我們說話的友人。

但是他沒有機會訪問我的住居，就匆匆上了征途。而寫在我的紀念冊裏的題句卻成了讖語。因為當我在戰後回來的時候，舊居附近的建築物，都因為日軍要擴建飛機場全部拆去了。一世紀來殘留的古風已經消失。而我多年來居住的房子也不再存在了。

如今，我還能保留的，是徐悲鴻為我題下的「向水屋」三個大字。



徐悲鴻「向水屋」題字

的箱子裏。在離開香港的時候，我把箱子交託別人保管，聽天由命。

三年後戰事結束，我回到香港來。僥倖得很，我的那隻滿載舊書的箱子居然還能存在，而那幅徐悲鴻的題字也重見天日了。

其實把自己的住居題名「向水屋」，也如我獲得徐悲鴻的題字一樣是很偶然的。那時候由於我的住居面向的是海，因而我用「向水屋」的題目寫過一篇描述這所房子的小文章，結果在一些朋友之間，這個住居的名號成了一種觀念上的存在；見了面，總是說什麼時候要去看看「向水屋」的風光。

說風光，實在也有一點點。我的住居是在一層頂樓上，屋外有一個寬闊的迴廊式的陽台。憑著石欄，可以看見一片無際的天空（這不是在到處立體建築物的都市中所容易看得完全的），可以看見高聳的獅子山下面伸展過來的一塊巨幅的風景畫：一簇簇蒼翠的樹木和一片灰黑的屋頂，——一世紀來不曾變動的古風的殘留。隱藏在那裏面的，是村舍，作坊，醬園，尼庵和廟宇。

視線轉向另一邊，展開眼前的是海了。這個海是那麼深沉，那麼平靜，藍藍的一塊，像一面大鏡子。周圍的山嶺，有如珊瑚雕製的鏡框邊緣。鏡框缺口的地方，便是香港的門戶。每天，有往世界上各個地方去的船隻打從那裏開出去，也有由世界上各個地方來的船隻打從那裏開進來。風雨天，那給薄霧籠罩的遠山，給人以看一張水墨畫的感覺。天晴日子，那明朗得像透明似的景物，叫人聯想到南歐春日的風情。毛毛雨的晚上，遠處朦朧的點點燈光，恍如輕紗封住了鑲嵌在鏡子邊緣的鑽屑；月明的晚上，清爽的柔風鼓起銀蛇一樣的微瀾，有如大海在向著月華目語。……

這就是「向水屋」的環境。⁵

注

1 本段末原文有兩句：在某種意義說來，真叫人悲哀。

2 徐悲鴻（1895-1953），原名徐壽康，江蘇宜興人，畫家、美術教育家，曾赴日本、法國留學，回國後曾任上海南國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、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、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、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等。

3 王少陵（1909-1989），廣東台山人，畫家，1913年移居香港，加入香港美術會，曾為思豪酒店繪畫大型壁畫，1936年在思豪酒店舉行首次個展，1938年赴美進修，1947年回國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，1948年後在美國定居。

參考本書下冊〈深秋草〉、〈藝壇俯拾錄（十三）〉，頁511、610。

4 思豪酒店原名思豪大酒店，位於中環遮打道，於1956年重建為歷山大廈新翼。

5 原文句前有「美嗎？」三字。

6 廖冰兄（1915-2006），原名廖東生，廣西人，漫畫家，三十年代開始創作漫畫，於1947年來香港，曾參加「人間畫會」，與黃新波等籌辦「風雨中華」畫展，於《華僑晚報》、《星島日報》發表連載連環漫畫，1948年與張光宇、特偉、鄭家鎮、黃蒙田等出版《這是一個漫畫時代》叢刊。1949年回到內地。

文藝茶話會與〈新地〉

本文原刊《大公報·大公園》，1977年10月31日。其後收入《向水屋筆語》。參考本書上冊〈書的裝幀〉、〈司徒喬瑣憶〉，頁80、190；下冊〈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〉，頁783。

儘管有人說香港是一塊「文化沙漠」，但是¹在三十年代左右，香港已經有一群青年人在熱情地從事著新文藝工作。他們不但有過文藝團體的組織，而且也出過一些同人雜誌。這大概是不大有人知道的事。

在那時期，差不多每一份規模較大的報紙副刊都有個文藝版，刊載新文藝範疇的東西。在這些副刊中，值得記憶的是《南華日報》²的〈勁草〉。³它是在那時期的文藝副刊中水平較高，態度較嚴正的一個。香港較為優秀的文藝工作者都是這個副刊的撰稿者。司徒喬從法國回來，在香港告羅士打行⁴舉行畫展的時候，也是由〈勁草〉擴大版面為他出個《司徒喬畫展特輯》⁵，並且在展覽會上派送的。有部分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上演話劇時，也通過人事關係把有關稿件寄到〈勁草〉，出版「演出特刊」以作宣傳。因此，〈勁草〉在當日是頗引起人們重視的一個報紙副刊。

為著珍惜這個副刊的成績，那位思想開明的報社社長陳克文⁶，認為副刊與作者之間應該有所連繫，才能把副刊搞得更好。於是主動發起一次招待作者的聯歡會。由〈勁草〉編者出面，邀請全體作者參加。那一次聯歡會的地點是在告羅士打酒店頂樓的茶座。參加聯歡會的共二十多人，除了報社主人之外，都是青年文藝工作者，其中包括寫小說的，寫詩的，寫理論文章的，寫戲劇的，從事木刻畫的。這個聯歡會的目的，原是在於使作者們藉此機會互相認識，聯絡感情；但是在茶話進行中，大家都感到這樣的敘會很有意思，不妨經常舉行。有人提議，有人附和。經過一番討論之後，作出決定：以後每兩星期舉行一次，時間是周末的下午；地點不固定。名義就叫「文藝茶話會」。由報社作東道。茶話會的基本成員是〈勁草〉一群作者，但是可以個別邀請志趣相投的文藝朋友參加。

「文藝茶話會」僅僅在一定的期間來一次「以茶會友」，談談閒話，究竟也太單調。為了使這個組織在文藝工作上能夠發揮一點建設性作用，即席又決定了出版一個文藝雙周刊，定名〈新地〉。在茶話會中推出兩人負責編務工作。

〈新地〉作為〈勁草〉所屬報紙的一份獨立性附刊出版，篇幅佔一頁報紙的



文藝茶話會的一次聚會，右二為侶倫。



全版。由於篇幅比普通副刊多了一倍，可以容納較多的東西，編排上也可以有多樣的變化。形式是頗新的。它的基本作者除了「文藝茶話會」成員，還歡迎通過介紹而來的外稿。因為有多方面作者的緣故，一開始就刊登了介紹蘇聯電影（當時蘇聯電影還沒有在香港放映過）和日本的「新興文學」的作品。沿著這條編輯方針的主線，隨後也刊登了好些思想較進步的關於文學或是藝術的理論性譯文。

作為一個文藝副刊來看，〈新地〉雙周刊在當日可以說是態度嚴肅，內容具有特色的一個。可惜的是，這個雙周刊只是持續出版了大半年光景。由於報社改組，行政和人事上都有了變化，〈新地〉便隨「文藝茶話會」的結束而停刊了。

注

- 1 原文「但是」後有「沙漠也有綠洲的」一句。
- 2 《南華日報》，汪精衛系統的喉舌報，1930年由朱樸、林柏生、陳克文創辦，1945年1月停刊。參考本書下冊〈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〉，頁783。
- 3 〈勁草〉，《南華日報》的副刊，侶倫1931至1937年任主編。參考本書下冊〈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〉，頁783。
- 4 告羅士打行原址為香港大酒店，1926年發生火災，重建為告羅士打行，樓高9層。告羅士打酒家位於中環告羅士打行9樓。七十年代重建為告羅士打大廈，位於中環德輔道中與畢打街交界，現為置地廣場一部分。
- 5 1932年秋，畫家司徒喬在香港開畫展，侶倫為司徒喬編畫展特刊。
- 6 陳克文（1898–1986），廣西岑溪人，1925年加入國民黨。



詩刊物和話劇團

本文原刊《大公報·大公圖》，1977年11月5日。其後收入《向水屋筆語》。參考本書下冊〈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〉，頁783。

似乎任何地方的文藝領域都有同樣情況，愛好寫詩的人往往比愛好寫小說或其他作品的人要多些。辦雜誌的向作者們索稿的時候，要小說比要詩較為困難，便是這個緣故，這種情況，香港也沒有例外。

在第二次大戰前，香港的新文壇上就出現過好幾個成就頗好的青年詩人。其中最突出的一個是李心若。¹他是西醫生李崧的弟弟。李心若的詩經常在上海的文學雜誌發表，在香港發表的卻不多。此外寫詩的有劉火子²、李育中³、杜格靈⁴、張任濤⁵、黎學賢⁶等人。劉火子在抗戰初期印出過一本詩集（書名已忘記）。⁷還有一位很年輕卻同樣努力寫詩的易椿年⁸；這個人頗有詩才，可惜才十九歲就因肺病死去了。⁹

直至現在，香港似乎還沒有一本純粹以詩做內容的刊物。但是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之間，香港卻已經出版過這樣性質的刊物了。那就是上述一群寫詩青年所辦的《詩頁》和《今日詩歌》。¹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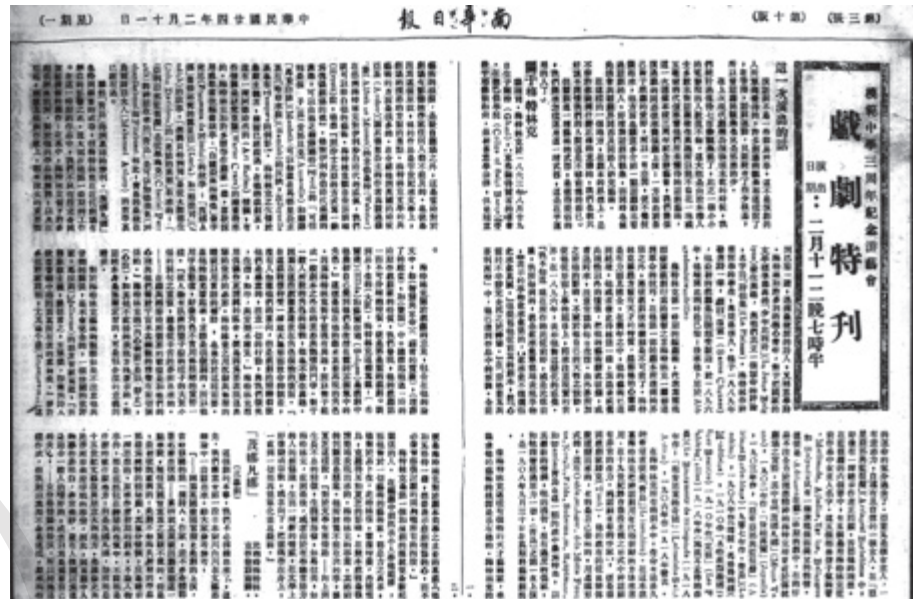
一般地說，詩人從來是文人之中最窮的，在文藝作品也成為商品的社會，詩根本賣不到多少錢；一個人熱衷於寫詩，可以說是純然基於興趣和一股偏愛的熱情，——也可以說是一股呆勁。就是憑著這麼一股呆勁，他們不但不斷地寫，還要拿詩去出刊物；寧可大家掏腰包，集腋成裘地湊一筆印刷費，也得達成共同的心願。上述的兩本詩刊就是這樣誕生的。

《詩頁》是形式很別致的一個刊物。它是廿四開本，卻切成方形；二十五頁左右；白報紙印刷，用大紅灑金的土紙作封皮，粗線釘裝；封面左邊貼上狹長的白色籤條，籤條上印著圍了



《不死的榮譽》書影

《南華日報》〈模範中學三周年紀念遊藝會戲劇特刊〉剪報



黑邊的「詩頁」二字；看起來具有簡單樸素的民族風格。翻開封面，是一張用黃色紙張印刷的目錄。為了節省成本，這本詩刊只有書頁部分和目錄由印刷店印，其餘裁切封面紙張，黏貼封面籤條，和逐本打孔穿線，釘裝成冊等工作，全部是由幾個興致勃勃的青年詩人共同動手去完成的。為了要推銷得普遍，全部釘裝好之後，幾個人便各自挾一部分書，分頭跑到各書店和報攤去直接寄售。這真是詩人才有的行徑！

《今日詩歌》是繼《詩頁》之後不多久出版的。廿四開本，頁數和《詩頁》差不多，白道林紙作封皮。封面印上褐色的木刻大字「今日詩歌」，有一張木刻襯畫。記得這個封面是由木刻家溫濤¹¹設計（溫濤後來去了延安，史諾的《西行漫記》¹²裏曾提起過他）。這一次是直接交給書店發行的。

兩本詩刊的銷路都很不理想。理由很簡單：在那時候的香港，愛好新詩的人並不多，幾乎是寫詩的人就是讀詩的人。不過，幾個辦詩刊的青年，也不在乎銷售的多少，他們出版的動機只在乎自我的滿足。因此究竟賣出了多少冊，也不向書店結算，就連賣剩下來的也懶得去收回來。

香港正式有話劇上演，也是三十年代前後的事。

在話劇出現之前，一般人所認識的只是所謂「白話戲」。那是一種自編自演、題材庸俗的「戲」，多數是在學校的什麼慶典上，作為遊藝節目演出。但是